

● 李琚平著

● 新疆大学出版社

# 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

XI FANG WEN XUE PING LUN FANG FA LUN YAN JIN

文藝學美學叢書



# 总序

劳承万

这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商品大潮横流的岁月。对于学术，前者确是一种挑战，后者似是一种炼狱。作为“孤岛”的学术领域，正在风雨飘渺之中。

然而，“君子忧道不忧贫”！

莘莘学子仍在不断地探索、追求。追求，本身是一种张力，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目的。当今，作为“孤岛”的学术，到底是什么？

学术是一种事业，然而更是一种理想。

作为理想，它具有岩石般的质朴，它往往是在一切粉饰都被生活的严肃性磨去之后，才能呈现出来。作为事业，它无需庸人自忧，也必然地会有前仆后继的追求者。不管是作为理想，还是作为事业，在追求中，热恋者总是默默地耕耘，默默地奉献真诚和良知。

正是基于对学术研究的这种理解，我们编辑了这套“文艺学美学丛书”。谨以此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变革时代和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本丛书的作者均由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组成，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拳拳云集南海之滨，望洋而从不兴叹，“却听涛声乐吟诗”。丛书编辑的成功，表明了在经济大潮日夜拍打、“乱石穿云，惊涛拍岸”的地方，仍有“智慧的痛苦”，仍有纯洁而高贵的精神求索，仍有“合目的性”的灿烂星光。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起因，来源于我们对大学中文系科研

与教学如何结合问题的重要思考和尝试。长期以来，中文系的基础理论都僵滞于“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残块框架上，无视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飞速进展和丰硕成果。鉴于此，我们尝试着对大学中文系教学——科研体系进行大胆改革。从“一”到“多”的关系来说，我们尝试以一种现代形态的基础理论作为学术基础，这就是现代的文艺学美学理论体系；从“多”到“一”的关系来说，各文学学科（尤其文学史学科），都在“阐释”的层面上，充分地显出现代“理论”功能，向文艺学美学（专业核心）辐射。由一而多，由多而一，双向互逆交流，形成大学中文系的新的教学——科研体系。总之，开拓视野，更新方法，以“论”阐“史”，力争在充分调动文艺学美学理论功能的扎实基础上，走出一条重新建构中文系教学——科研体系的新思路，开辟学术大千世界的新的途径。

就内容方面说，本丛书显得异常丰富多彩。它既包括文艺学新方法论、比较神话学、本体论诗学这样的基本理论的拓进，又有主体性与文体批评、艺术意境论、艺术形式本体论、散文潜本体研究、政治文化与新文学、新时期报告文学等专题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来改进大学中文系的教学、科研现状，调整知识结构，重新弥合科研与教学之间的不幸的裂痕。这个想法，有幸得到了香港同丰洋行董事长陈坚先生和新疆大学出版社的鼎力襄助，在此，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君子终日乾乾，乐在其中，愿与诸位同仁及读者朋友共勉之。

1998年9月于湛江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有重点地选取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方法论加以探讨，旨在揭示它们的内在真谛，并勾勒演进关系。本书认为，每一种方法论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们在貌似横空出世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条反拨或扬弃的线索。此外，对每种方法论所凭藉的观点和理论形态作了适当的叙述，对操作途径、方式和专用概念作了提纲挈领式的界定和厘清，以使读者在总体扫瞄的同时掌握各种方法论的要领。它可以作为理论工作者、大学教师、特别是研究生和大学生的**重要参考书**。

## 序

《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是琚平继《创作动力学》、《天汉雄风》出版之后的第三部著作。《创作动力学》属于文艺心理学范围，《天汉雄风》属于历史美学方向，这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则又涉猎西方文论史，看起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实则是琚平的学术研究策略。学术研究总要先博后专，先有古今中外的准备与研究，然后才会有某一方面的深入与发现。古今成大学问家者莫不如此。琚平学习先辈，也想由博而专，走出一个大模样来，作为他的老师，我衷心祝愿他获得成功。

琚平这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与我看到的几部西方文论方法论研究都不相同，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特色，这是很不容易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虽也有杰出的，但多数的研究总觉得隔着一层，难以达到极致。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学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语言的与文化的隔阂则是两大因素。汉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如若不是在中国这块黄土地上土生土长，很难理解其微妙之处。同样的道理，西语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也同样有其微妙之处，一个中国人，如不是始终生活在西方的世界，也很难理解他们思想的深奥与神秘之点。因此我始终认为中国人研究西方的文论是有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

的。但琚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以他的聪慧与执着，比其他的研究者前进了一大步，是难能可贵的。

我说琚平的著作比其他的研究者前进了一大步，不是有意吹捧他。这是有根据的。他的这部著作的一大特点，是把本世纪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重大发展与19世纪以前的文学评论方法论所奠定的基础联系起来考察，这是十分有意义的。本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从俄国20年代的形式主义批评开始，各种流派风起云涌，十分壮观，英美的新批评，德国的文本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批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荣格和弗莱的原型批评，德国的接受美学，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或一个接一个，或几个同时并驾齐驱，这种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转换，是前所未有的。一般的研究者，把20世纪的文学批评方法论演变，孤立起来看，只从本世纪社会的文学的演变寻找原因，结果使研究失去了根底，看不到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研究就必然带有重大缺憾。琚平的书，以鲜明的历史的观点，力图追寻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历史背景，把本世纪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看成是整个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必然发展，把本世纪发生的事追溯到柏拉图那里去，划定了发展的阶段性，理清了来龙去脉，对问题既作逻辑的阐述，又作历史的展开，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可以肯定，琚平在这里用力的确用得是地方，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看作一个活的有机体，从总体上考察它的发生、发展、变异、重组等各种复杂情况，搞清了它的内在的发展的机制。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整体脉络也就显露出来了，还历史以真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琚平的这部书是有力度和深度的。

琚平此书，与那些拼拼凑凑的书不同，他给自己的研究立下了三条原则：整体性原则，转换点原则，内在逻辑勾连原则，而且全书的确贯彻了这三条原则，使全书避免了芜杂性，而具有一种严整性。我这里想就转换点原则，再发点议论。“导言”中写道：“所谓转换点原则，就是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变的过程中，寻找导致方法论发生转折或变化的那些关节点。转换点类似于迫使河流改变的高山大原。以黄河为例，它从青海高原奔流而下，直朝东北而去，遇到阴山突然转折南下，再遇到华山阻遏，又拐向东方，走入大海。阴山、华山就是黄河流程的转换点。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转换点：就是以戈蒂叶、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评论和以什克洛夫斯基、雅克布森为代表的唯形式评论。”首先，这个原则的提出，不是人为的，而是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自身提出来的，与实际情况吻合的。其次，作者把戈蒂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批评与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作为转换点，是极有见地的。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发展史中，这的确是两次重要的“反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反叛”。由于这两次转折，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发展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转折点问题，实际上就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质变”问题，任何事物的历史，只要抓住了转折点，也就摸到了规律，揭示了历史的整体走向，因此是极为重要的。而在研究工作中，要达到这一要求，非对事物有深入的整体了解不可。这可以说是研究“史”一类课题中的难点，而琚平敢于向这个“难点”发动“进攻”，不但说明他有真正的学术勇气，而且也说明他有了这种实力。对此，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琚平在他的同届同学中，以治学刻苦与严谨著称。他这

次以较高的水平完成《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一书的写作，是意料中的事。我希望珺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未来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保持这种发展的势头，为祖国的学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童庆炳 1994.3.31

---

※童庆炳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持文艺学博士点的博士生导师。

# 目 录

|                    |           |
|--------------------|-----------|
| 总序                 | 劳承万       |
| 序                  | 童庆炳 ( 1 ) |
| 导言：如何看待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 | ( 1 )     |
| 1、道德评论             | ( 22 )    |
| 2、社会评论             | ( 67 )    |
| 3、非功利评论 ( 上 )      | ( 112 )   |
| 4、非功利评论 ( 下 )      | ( 114 )   |
| 5、心理评论             | ( 190 )   |
| 6、唯形式评论            | ( 217 )   |
| 7、“新批评”评论          | ( 269 )   |
| 8、神话—原型评论          | ( 394 )   |
| 9、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评论      | ( 344 )   |
| 10、比较文学评论          | ( 383 )   |
| 结束语：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研究展望  | ( 418 )   |
| 后 记                | ( 439 )   |

## 导 言

# 如何看待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

### —

1985年在我国兴起的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研究的热潮，现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国内同仁的著作也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这些著作中，有的侧重于介绍，有的在介绍中加入自己的评论，还有的将那些借用新方法写成的文章作为范式，以勾勒现阶段文学评论的发展过程。无疑，这些著作都开垦了我国原来较为贫瘠、单薄的文艺学领域，并播撒下多样化知识的种子。应该说，它们对于呼唤、宣传新方法论且使之扎根，具有先锋性作用和开拓性功劳。

但是，由于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毕竟属于初创阶段，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后来又没有扎实的 准备，所以，这些著作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从研究范围看，这些著作大都侧重于20世纪以来的新方法论而忽视19世纪以前的传统方法论，更忽视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联系。这无形中给大学生或社会中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从弗洛伊德或俄国形式主义以来的新方法论是天外来客，它们没有任何先前的征兆，而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另有一

些著作，对19世纪以前的方法论虽有所顾及，却脱离“文学”评论的特点，将它们用演绎、归纳等纯逻辑的范畴提拢起来，似乎19世纪以前的传统方法论就是演绎法和归纳法。这无形中给人留下两个疑问：一是新方法论是不是逻辑方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是新方法论是不是与逻辑方法根本不相容？还有一些著作力图纠弊扭偏，尝试将19世纪以前的方法论融入著作，但又只限于对道德评论和社会评论等方法论作出较为浅显的或笼而统之的分析，而没有从文学本质、文学生成、文学本体、文学作用等方面宏观地点出它们与20世纪以来的新方法论的反拨或相通之处。这样，要么是只知道19世纪之前有道德评论和社会评论两大方法论，但又不知道它们各自的特点和操作途径；要么是大致知道这两种方法论的特点和操作途径，但又不知道它们与20世纪以来的方法论之间的勾连关系。

上述由研究范围确定不当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还不是主要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确定不当所导致的相对狭小或顾此失彼（即没有从整体上考虑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生成和发展态势）状况，必然造成视野上的局限；这就是对于唯美评论和唯直觉评论等两种方法论的忽视。在今天之前，唯美评论和唯直觉评论在中国理论界一直不受重视。如果说过去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而不敢作实事求是的研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到今天，还忽视这两种方法论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发展历史上的作用，就难以原谅了。假如我们把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演进看作一个整体，把20世纪以来的新方法论看作是19世纪以前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和有机构成，假如我们能够客观地细心地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或武断地观察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发展史，就绝对不

可能无视这两种方法论的重要作用！

至于那些仅仅把成功地运用了西方某些方法论而写出的论文作为文学评论方法论的范型，并以这些范型为研究对象，由此出发来描画西方某些文学评论方法论的原生态，进而传授他人的著作，笔者认为，更不可取。这是因为，当某人摹仿或借鉴某一方法论研究文学时，其中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允许误解”和“允许创造”的成份。这种误解和创造可能恰恰弥补了原有方法论的不足，由此也恰恰成为此论文成功的原因。但是，这种论文是否能准确地传达出原方法论的精髓呢？那就很难说了。如果以这些成功的论文为材料，来研究中国人对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所接受、领会并创造的程度，勾勒当代中国文学评论方法论的发展高度或变化轨迹，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将它们作为样板分析，并从中寻找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原型构架，明显是要误人子弟的。这不仅导致人们对西方某一方法论的糊涂认识，而且导致由缺乏基本功、缺乏高度而造成的自我迷失。古人有言：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这句俗语的真理性的，就在于它强调了从原创、原本意义上学习某一方法、某一技能的重要性。尽管颜真卿、柳公权的字有很多不足，岳飞的拳脚也不是天下无敌，但是练字、练拳的师傅总强调徒弟们从临摹颜体、柳体的一点一捺、从比划岳家拳的一招一式入手。为什么？这就是为了让徒弟们占据一个高起点，在忠实地理解了高方法、高技能之后，再去融通、创新。练字、练拳最怕的是没有进入一家之学的堂奥，就开始从事龙飞凤舞或花拳绣腿的“创造”。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新方法论并不是颜、柳字，也不是岳家拳，它们不但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造诣，相反还有许多是尝试性的和有

争议的。尽管如此，但并没有阻挡它们成为文学评论方法论中的新潮流，也没有阻挡它们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文学问题提供高起点和新起点的启示。因此，以别人成功的论文为范型指教学生或社会中人，不但不能使其获得某一方法论的原型形态，从而站在新的或高的起点看问题，相反有可能窒息他们的一点灵犀，从根本上杜绝了他们在比较、碰撞中产生创造性火花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有三种不良后果产生：一是人们由于没有窥视到某一方法论的内在奥妙而丧失研究的兴趣，认为它“不过如此”；二是培养出一大批低劣的摹仿者；三是一大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纯实用型人以半通不通、半悟未悟的知识为标准，轻易地否定这个或随意地肯定那个。

从方法论的分类和排列情况看，已有的著作也不能十分令人满意。它们有的是综合型，将逻辑方法、20世纪以来的文学评论方法，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排在一起，虽然面面俱到，但既庞且杂。有的是随机型，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中任意抽出自己相对熟悉、相对欣赏的几种，各自为章，虽然题头醒目，但各章之间缺乏内在勾连。有的是断代型，以20世纪以来的方法论的衍变为线索，虽然重点突出，但各章的归属缺乏科学性。最为常见的是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四分法。且不说分属于作者、作品、读者部分的各种方法论是否完全与社会文化因素无关，仅就作者、作品、读者这三大部分内部的分类来说，就已经有些勉强。不错，20世纪以来的文学评论方法论确实呈现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足点，但是，这些方法论的兴起与衰落，是不是严格按照作者、作品、读者系统的顺序来发展的呢？显然不是！有些方法论虽然可以划入作者、作品或读者系统，但在方法

论的嬗变兴替中却是同时兴起，或交错进行的。因此，当有的著作在列出作者、作品和读者等三大系统且缺乏必要的交待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对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作如是观呢？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开口闭口辄以西方20世纪文学评论方法论经过了作者、作品和读者三个阶段为立论的基础，是否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呢？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将整个文学活动的构成列为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等四种因素，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把这四种因素按如上顺序组成动态流程，它们恰好构成文学活动的完整序列，其中每一因素都是文学活动整体之链上的重要和必要的一环。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文学活动的四种因素、四大环节是否恰好对应于文学评论中的四种方法论呢？换言之，多彩多姿的方法论是否非要机械地纳入这四个概念之中呢？我认为，不一定！首先，如果用这四个概念来套，比较文学方法论应该归入哪一个系统？其次，如果把世界作为基础和背景，把作者 $\leftrightarrow$ 作品 $\leftrightarrow$ 读者的双向影响看作在这个基础和背景之上和之前的活动，也不是不可以的。实际上，文学活动确实是以世界（宇宙、自然、社会、文化等）为基础和背景的活动。丧失了这个世界基础和背景，文学活动就失去了依托，失去了支撑点。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怎么能将作为基础和背景的世界与文学活动的具体环节（即三R关系）并列呢？由此看来，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论只是文学活动整体构成的各个部分，而不能把它作为划分文学评论方法论类型的框子。

近年来，有些学者已经看到将20世纪文学评论方法论分为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文化（即世界）等四大类的机械和僵硬，尝试从19世纪以前的文学评论方法论和20世纪以来

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入手，并打破原先的排列，从而尽力使文学评论方法论的衍变呈现为动态的流程。这种尝试很好。但是，如前已述，由于他们没有找到19世纪与20世纪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结合点和转捩点，因而无法理解19世纪之前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分离、整合、反拨、转化的进程，也无法把握20世纪以来的方法论演变的踪迹；再加上由于认识的模糊所导致的无法提纲挈领地直接抓住具体的操作特点进行入木三分的透视和解剖；所以，此类著作虽然也想有所突破，一新耳目，却没能达成自己的目的。它们对于方法论的分类和排列虽然打破了四分法，但也只限于从时间维面上拉出一个简单的顺序，而无法从方法论衍变的内在根据上勾勒出动态流程的曲线。

严格地说，1985年以来所兴起的文学评论方法论热潮，只是对于20世纪以来新方法论的热情，而不是对整个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热情。任何一种学术研究热潮在兴起时，往往是情感的成份多而理智的成份少，因为正是那种盲目的、一拥而上的对于新知识的崇拜或渴求，才能造成一种“热”。热是一种好现象，亦是一种坏现象。它能促使以往不被人注目的问题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沸点，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对它的关心之中，并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一步；但是，热也能掩盖肤浅、掩盖鱼龙混杂，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从而阻碍对它的深入考察。热过之后，如果不继以艰苦细致的研究，不继以客观冷静的反思，从而稳步前进，那么，必然难以留下具有真知灼见的东西。

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热潮中，由于忽视了对于19世纪及其以前的方法论的思考，忽视了它对于20世纪新方法论的影响的思考，大家都把兴趣集中在对于新方法论的介绍和

套用，以新求胜，以奇为荣，所以导致了生吞活剥、急功近利的现象。一时之间，西方20世纪文学评论近百年间形成的各种方法论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都有了它们的介绍者、媒介者和追随者，大批真真假假的论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种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出现。你谈弗洛伊德，我谈荣格；你谈结构主义，我比你更超前，谈解构主义；你还正在介绍、阐释，我已经开始运用；我刚开始运用，他已经指手划脚地作完评价工作了。由于人人都是急匆匆地上阵，又都是依靠仅有的几篇译文或一本译著，作为从别人武库中新窃的火种，就展开了一场志在必胜的学术大战，所以，在紧锣密鼓中刚刚虚晃了一招两式，就不得不罢手。弗洛伊德倾尽毕生精力所研究的问题，被有些几千字的文章说得一清二楚，“新批评”中有些复杂难明的内在纠葛，亦被有的人几句话道尽。是我们过于聪明，还是西方理论家们过于肤浅，过于简单？在热潮中，谁也不愿下苦功深入钻研，只恨西方新理论、新方法产生速度太慢，满足不了介绍和使用的需要。各种新方法论都被派上用场，并被演练了一番。当没有新东西拿出来炫耀的时候，大家就厌倦了，也失业了。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神秘的魔袋在短时间内被中国人洗劫一空，似乎再也没有新鲜花样了。天下之大，理论之多，竟使人们找不到所要研究的对象。这真是对手尽失，英雄唯有在南墙上撞头之憾！

这就是热潮所带来的结果：人们刚知道雅可布森的名字，就以为通晓他的理论了；人们刚知道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这个名词，就以为有关它的一切研究都是炒剩饭了。

其实，真正严肃的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工作还没有完全开始呢？

## 二

要想理解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真谛，必须先了解它的演变历史。要想了解它的演变历史，首先牵涉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它的演变过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它的研究才好展开。

如何看待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演变呢？

笔者在此提出三条原则：第一，整体性原则；第二，转换点原则；第三，内在逻辑勾连原则。

所谓整体性原则，就是把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看作一个活的（至今还在活动着、变化着）有机体，从总体上考察它的发生、发展、变异、重组等各种情况，搞清楚它的内在起承转合机制。

印度民间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五个盲人想获得有关大象的知识。他们请求养象人让他们实践实践。养象人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们五人同时对对象操作了一番。第一个人说：大象是一堵墙；第二个人说：是柱子；第三个人说：是绳子；第四个人说：是棍子；第五个人说：是扇子。他们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惹得养象人哈哈大笑。对于同一个对象，

“实践”操作的结果却五花八门。为什么？就因为缺少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的能力和方法，各人仅仅依据自己所摸索到的局部情况下结论。谁也不能否认他们五个人没有实实在在的依据，可是，他们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而且，即使将他们的结论机械地组合起来，也不能构成大象的本来面目，因为，大象≠墙+柱子+绳子+棍子+扇子。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研究也与此类似。如果我们不从整体上考察，不把个别的方法论放在演变流程的环节中考察，只是就事论事，由此一